

郁方董和《济荒记略》

——嘉定不平静的1849年

黄友斌



中国古代,灾荒时而有之。赈灾,一般来说是官府的职责。但在晚清,却有不少江南乡绅、富商参与到赈灾的社会公益事业中,其最早的文本记载,就是嘉定人郁方董的《济荒记略》。该书辑录了清道光二十九年(1849)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,记述了嘉定民间义赈的各种方法,是难得一见的赈灾史料。

郁方董其人

《光绪嘉定县志》载有郁方董小传,郁方董,字藻儒,一字舒帷,号小晋。博学工诗文,肄业国子监,考取内班,应金台书院课,为卓海帆相国、龚文龄府尹所赏拔。晚年游幕湘鄂,以文学为时推重。曾应房县聘修邑志,有《说研斋集》。

小传没有写明郁方董的生卒年,不过可以推测他主要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,曾经在国子监读书,并考取内班。国子监是古代最高学府,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“监生”,由全国各地按考试成绩和道德品行推荐入学,到了晚清,也有不少监生是纳粟入学的。内班,就是监生在国子监学习,完成率性、修道、诚心、正意、崇志、广业六门功课肄业后,按成绩分内、外班。内班的人数少于外班,而奖励高于外班。由此可知,郁方董是学习优秀,只是并未在科举考试中考取功名。

之后,郁方董在金台书院任教。金台书院位于如今的北京市崇文区,当时属顺天府官署管理,是京城一所条件较好的书院,有“首善义学”之称。该书院所收学员主要是京师和各省准备参加会试、殿试的举人和贡生,书院主持人多为名士。

根据小传记载,当时对郁方董赞誉有加的有两位大人物,一位是卓秉恬(1782—1855年),字静远,号海帆,四川华阳(今四川成都)人,清嘉庆七年(1802)进士,曾任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,协办大学士、文渊阁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,赠太子太保,谥文端。另一位则为龚文龄(1795—1855),榜名昌龄,字是周,一字西园,号蔗汀,福建侯官(今福建福州)人,嘉庆二十五年(1820)进士,曾任奉天府丞兼学政、顺天学政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、工部右侍郎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郁方董父亲郁淳在县志上也有记载:郁淳,字晋香,国

子生。清道光元年(1821)考职一等,以主簿分发安徽,历署望江县华阳、桐城县白沙,历任滁州大鎗巡检,凤阳典史等。郁淳的品级虽低,但在位期间颇有名望。在凤阳时,他着力改善监狱条件,向狱囚生发放草席,并每日增加一顿稀粥。在他调任定远主簿时,正遇荒年,流寇闹事。郁淳果断捉了流寇首领李容孜,押送上司,深受器重。此外,他每到一处,几乎都会举行文会,结交当地文人雅士,共同商讨施政方法。可以说,郁淳的这些经历,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了儿子郁方董。

而《民国嘉定县志》上则载有郁方董儿子郁寅亮的相关信息:郁寅亮,性方正,曾任湖北候补主簿,升用县丞,后历任枣阳主簿、保康知县。有意思的是,郁寅亮居官时,每当开庭听讼,郁方董都会在屏风后听着,若儿子语言行为稍有不肖,结束后会立即严切申戒甚至训斥当官的儿子。

此外,郁方董的《说研斋集》,由张修府、程庭鹭作序,黄宗起作跋,谓其“诗境冲淡、随遇,与香山、放翁为近”。

1849年的大水灾

清道光二十九年(1849),长江中下游的三江(江苏、浙江、江西)二湖(湖南、湖北)及安徽发生大水灾,以江苏最为严重。

《道光己酉灾案》记载:“本年自闰四月初旬起至五月止,两月之中,雨多晴少,纵有一日微阳,不致连朝倾注。平地水深数尺,低区不止丈余,一片汪洋,仅见柳梢屋角。二麦既败于垂成,禾苗更伤于未种,民力多方宣泄,无计不施,而水势有长无消,工本徒费,溷复无期,秋成失望。一灾并伤二稔,民情困苦异常。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等属三十四厅、州、县,无处不灾,而且情形极重。”清代姚济《己酉水纪闻》记录了松江当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的逐日天气信息,其中总计降雨二十六天,包括三场连续性降雨过程,而第三场降雨连续时间长达十二天,可谓“水骤涨,田尽没,水之大为百年所未有”,“暴雨倾盆,大雨如注,民大饥,饿浮载道。”王汝润的《馥芬居日记》提到,当时的水灾“大如道光三年(1823),而荒灾更甚数倍。”

而水灾带来的直接后果,就是米价疯狂飙升,当时每升米已从三十五文涨至六十八文,几乎翻了一番。灾难不仅致使民不聊生,也让部分灾民铤而走险,导致聚众劫掠的事层出不穷。《馥芬居日记》载,当年农历七月初九,嘉定“荒民拥挤至西门米行赵丹林子石君家,借米发钱”,“初十日,民打毁万兴家,又打其弟米店,又打叶长茂”,“十一日,打城中顺义米店。”可见,当时的乡村富户,随时都有失去全部财物、甚至家破人亡的危险。

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主动出击。当时,嘉定乡间某大户,积米千石余,米价涌贵之时,他召集邻里,指着米仓说:“你们若能保住它,这些米就平价卖给你们。”如此一来,立即得到了邻里的允诺,乐于为其捍卫米仓。

到了七月中旬,地方富绅秦溯萱(1771—1853)又请求动用义仓本钱,发放临时救助金,标准是每户大口4文,小口2文,以抚恤民众。

义仓是由民间集资、地方富绅管理、专救本地灾民的备荒仓储,其筹措渠道包括摊捐、劝捐、义田租谷等,由乡民推举公正殷实之乡绅管理,地方官府负有稽查职责。

国子生、曾任兵部员外郎的秦溯萱是嘉定城首屈一指的大户,一直以仁心义举荫泽桑梓。《光绪嘉定县志》载,清道光三年(1823)、十三年(1833)、二十九年(1849),嘉定地区岁荒,秦家“捐赈皆万计”;道光年间,钱门塘两次大水,秦溯萱独力捐资合厂平粟花米,里人曾筑“秦嵩堂先生祠”(俗名“长生堂”),以示崇德报功劝善之举;清咸丰三年(1853),为防止太平军,他还资助了本县的防务,“捐贖以巨万计”。

在此次灾情中,不可否认的是,地方富绅的义举对嘉定平安度过灾情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同时,也深深影响了郁方董,他于次年,即道光三十年(1850),完成了《济荒记略》一书,不仅详细记载了此次灾情,也记录下了嘉定民间义赈的各种方法。

《济荒记略》及义赈方法

为郁方董《济荒记略》作序的,是江苏震泽(今江苏苏州吴县)人张履。张履(1792—1851),原名生洲,字渊甫,清嘉庆二十一年(1816)举人,是鸦片战争时期一位很有成绩、很有特色的现实主义诗人。其诗论主经世、尊情,多咏道咸时事,关切国计民生。其记事诗大体有两类:一类述灾民苦况,揭官吏贪庸;一类记鸦片战争,于战场形势,敌我胜败,以及侵略者的贪婪残暴,抗敌将领的慷慨死节,投降派的畏敌误国,皆刻画生动,堪称诗史。

张履在《济荒记略》序中提到:“岁己酉,吾邑大水……有司邑士夫多方调护,俾十数万穷黎,不至多填沟壑。”郁方董则在书中更加详细记录了当年嘉定多方赈灾、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,认为“吾邑绅富踊跃为善,多方设法,其事简易可遵”。

《济荒记略》记录了“平粟”“平粥店”“平粥担”“施粥筹”“施钱”“施饼饵小菜”“施寒衣”“施布棉”“施柴被”“助族戚”“济邻里”“助寒士”“贩佃户”“发谷种麦种”“代赈农具”“济女红”“卖平花”“收养遗孩”“施医药”“施疗饥丸”“门口布施”“施棺”“暗中布施”“推广布施”“酬愿布施”“印施救荒善书”“超度孤魂”“预备积贮”等二十八种赈灾手段,可谓一份考虑周全、措施完备、方便实用的赈灾方略。但不管是施钱还是施粥、施饼、施衣,无论是发放种子还是发给农具,都是地方富绅主动或被动的作为。

“平粟”就是各家大户开的米店不涨价,但也不是敞开供应,而是就近凭票供应。比如,西门的黄氏,粟完平米,又粟杂粮。

有了米还要有火,才能将生米煮熟成米饭。于是,西门的大户黄铤,即黄汝成之父,建议在折漕报功祠设平价粥店,于每日早上二次、中午二次卖平价粥。买平价粥需先买筹,再凭筹领一大碗粥。嘉定西乡受灾最重,于是出现



扶老携幼,成群而出领粥的场面。为什么不直接免费施粥呢?因为此前曾设厂施粥,出现过掺灰、半生半冷、人工杂费多的弊端。东门有叶姓大户,望仙桥有张子渊、姜塘的浦映辉、外冈的陈宝斋,还有黄申浦、庄成之均开了平粥店。筹分四种,大的一枝12文,可领3大碗粥,中号的8文,领2碗;小号的4文,领1碗;最小的2文,可给粥1中碗。另外,还有一种免费的“牌粥”,就是一大碗热粥放在竹竿下,极穷者直接给牌领粥。

“平粥担”就是由绅富出资,两桶一担,约50碗,分挑到隘巷僻处,专供老弱疲病或老弱妇女残废,同样是每碗4文,按市价,绅富们1担约亏损300文。但绅富们“乐此不疲”,礼和担在西路,罗治谷堂担在北路,叶受祺堂担在南路,德裕堂担在北路,协兴担在南城内小街,这种“平粥担”直至1850年4月才停止。

有粥最好还要有菜,于是又有“施饼饵小菜”,即大户人家的主妇把自家贮存的小菜、大蒜、酱瓜、姜、盐、菜干等,交给平粥店或平粥担。

“施寒衣”就是散施丐者。秦家世善堂、黄守约堂、胡容德堂都参加了施棉衣和制柴秧背单。

“助寒士”就是帮助私塾先生。荒歉之年,学生多失馆辍学,没有了生源,私塾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“疗饥丸”,据说由许姓大户人家发明。其实就是将黄豆、芝麻煮熟做丸晒干,大如核桃,类似于现在的压缩饼干,据说吃一粒可以保证三天不饿。另外还有一种“济生大丹方”,在芝麻、黄豆、糯米中掺入熟地、黄芪、山药、白术、红枣,配入炼蜜,捣和为丸,据称“香美疗饥”,可存放数月之久。

在极不平静的1849年,嘉定还采取了义仓储谷平粟、提息钱采运接粟、借给灾黎口粮、县官府发抚恤银三千两、官府劝捐义赈八万数千余贯、上级拨银一万七千两等各种赈灾措施,终于稳定了社会秩序。

“荒年转眼已成丰,人力能回造化功。枯木向荣知爱日,冻禽舒羽荷春风。言关利济非无用,事可留传不蹈空。珍重一编为善乐,此心此理古今同。”《济荒记略》写成之时,嘉定的灾情已得到稳定控制,不仅作者郁方董十分高兴,地方上的富绅也因既做了善事又保住了财产而觉得欣慰。张文淦、叶慎斋、王澐士还有郁家纷纷“恣惠助梓”,于是才有了流传至今的《济荒记略》。

相关链接

《济荒记略》序

救荒之政,妨于《周礼》,杂见于历代史书,既无法不备矣。顾方董传于古人,病必愈于医手,因时制宜,厥有妙用。

岁己酉(1849),吾邑大水,奔走其间,赈灾无术。幸赖皇仁广被,及良有司邑士夫多方调护,俾十数万穷黎,不至多填沟壑。仁心仁术,有足称者,郁君小晋慧业文人也。秋赋屢膺首荐,书院每冠其曹,然未有以经济称之者。今春书来商榷平粥诸务及义仓事宜,洒洒数百言,并和余元旦四诗,德德于救荒之策,洵乎能文章、裕经济矣。君自幼侍宦皖江,尊甫晋香先生以考取尉定远,緝盜殲奸,不避艰险。大宪委勘凤郡灾荒,区别分数,归于实是,并捐俸制芦席,以掩道殍。权淞阳分篆,施茶饮以惠行人。典凤阳狱,人给一草荐,日与糜粥一次。循善惠政,流载口碑。君夙承庭训,宜其慈祥之念、匡济之怀,殷然不释。他日本其先德之遗,济之以学,其裨益证有限量哉。兹辑邑中救荒诸事,为《记略》一书,而属言于余。余惟欧公云:事有可记者,他日便为故事。是书特一时之迹,要可为后事之师。因书教语归之。

道光庚戌戌变法七月既望
愚弟子泉子渊甫



清道光水灾受灾群众